

国民党与 共产国际

1919 — 1927

李玉贞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吴继平
责任编辑:史 伟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李玉贞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
ISBN 978-7-01-010665-6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中国国民党-研究-
1919~1927 IV. ①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7302 号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

GUOMINDANG YU GONGCHAN GUOJI(1919—1927)

李玉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3

字数:725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0665-6 定价:7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一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题目。长久以来，这种关系都披着神秘的面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和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展，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历史的真面貌逐渐呈现出来。

一般来说，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现已发表的论著也大抵侧重这一方面。然而，李玉贞先生推出的新作则系统探讨了1919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我们在这段历史的认知。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是最早开始在海外收集有关档案资料的大陆学者。依据多年积累的史料和深入的研究，她在这部著作中不但记述了鲜为人知的事实，澄清了一些历史疑团，还摈弃了以往按照共产国际理论来解读这段历史所形成的偏见，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

十月革命后，苏俄处境艰难。为摆脱困境，列宁想到了中国。不过，苏俄对华外交的对象不是单一的，它试图脚踩两只船、甚至几只船。苏俄一方面派遣正式外交代表赴北京，与北洋政府接触；另一方面又派遣共产国际的使者，联络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势力，希图推翻这个政府，促进东亚和世界革命。在中国方面，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欲与北洋军阀和其他实力派争雄，也亟须争取外部世界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在寻求西方援助无果的情况下，孙中山转向苏俄。正是在苏俄的援助之下，国民党具备了问鼎全国政权的实力。此后，在斯大林领导下，苏俄的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政策又在处理国共关系时重演。不过，这一次却遭到了极大的失败。

在记叙这段迷离曲折的历史时，李先生选择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视角，以苏俄和中国国民党各自的利益诉求为分析的主轴，探讨了双方合作的基础及限度，双方分歧的由来与矛盾激化的原因，清晰地勾勒出国民党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本书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颠覆了一些传统的说法，其中四点尤令人印象深刻：第一，苏俄与国民党是因各自的利益需求而走到一起的，最终又因利益冲突而分手。第二，统领和支配着苏俄对华外交的是其国家利益，而这种利益具有多重性，苏俄外交除巩固和维护



国民党 与共产国际

1919—1927

GUOMINDANG YU GONGCHAN GUOJI

新生革命政权之外也承袭了沙俄扩张主义的传统。第三，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不仅是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也是苏俄外交、包括对华外交的一个重要工具，其奉行的是为苏俄外交服务的方针。第四，当年苏俄对中国的情况缺乏基本的了解，这导致了一系列判断失误和对华政策的混乱与矛盾，这种脱离实际的政策也根本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同各国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发生如同其与中国国民党这样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特例；而在中国近代史的这个重要时期，如果不了解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就难以把握历史的全貌，难以理解中国与苏俄关系的演变以及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会引起普通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也会引起学界同仁对这段历史更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章百家

2011年10月12日

序 二

李玉贞教授积三十年之功，写成《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一书，就1919—1927年间，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进行了客观的深入的研究，其内容涵盖了中苏外交、党际关系、党务、组织、军事、政工、思想、理论及众多相关人物活动，全面地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场景。

作者以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于1943年5月发表的讲话为切入点，展开论述。斯大林说：“无论马克思和列宁在世时的经验，还是今天的经验，都已经表明，不可能从一个国际中心去领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当初建立共产国际时，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能够把全世界的运动领导起来。这是我们的错误。”共产国际及其策动的东方革命运动，事实上是“以主观革命愿望为基础的”，激进的“尽快”“加速”历史进程的盲动，中国20年代大革命的结局就是有力的证明。在中国大革命过程中，斯大林幻想变国民党为工农革命党，变国民革命为工农革命，变国民政府为亲苏政权，变减租减息为暴力没收土地，变蒋介石为“雅各宾党人”，变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大革命的结局正是这种一相情愿幻想之破灭，而非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国民革命仍在进行，并取得胜利。

本书指出，对1919—1927年间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双方关系的研究，不应再以斯大林已经承认“错了”的标准和律条为出发点，而应对苏联史学的陈旧观点提出一系列质疑，重新探索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诸如：

1. 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何以与共产国际理论对立？根本分歧何在？
2. 中国第一批拥护苏俄的人，对十月革命了解多少？接受、选择了什么？忽略了什么？由于不了解这场革命而陷入何种误区？
3. 把是否赞成苏俄革命模式和共产国际理论，当做判断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保守或反动的标准，是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吗？
4. 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学说，孙中山不赞成苏式革命理论，共产国际便说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并实行发展其党内左派、争取中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进而分裂国民党的策略，到底产生了什么结果？
5. 国民党曾经访苏的使者，如蒋介石、胡汉民、邵力子、汪精卫等人，为什么一度被共产国际称为“左派”？蒋、胡、汪三人，日后为什么都成了反



国民党

与共产国际 1919—1927

GUOMINDANG YU GONGCHAN GUOJI

苏派？

6. 1926 年底到 1927 年夏，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究竟如何估量？……

作者在探索上述问题时，除了吸纳国内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大量地使用了国外新近公布的原始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诸如原版五卷本大型档案文献集《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英文版《国际新闻通讯》，俄文版《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速记记录，等等。特别难得的是挖掘和使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许多档案。这些资料足以支撑作者的理论探索和史实考证，进行严谨周全的理论阐述，真实正确的历史叙事，从而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面貌，给读者送上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具反思意义的历史读物，并在已经问世的同类著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铁健

2011 年 9 月

序 三

十多年前，笔者读到李玉贞教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所引用的新旧史料，增加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

2006年秋，我在上海参加“孙中山140周年诞辰研究会”，李教授也会。会后因有共同兴趣，曾数度交谈，相当投缘，才种下她要我写这篇序文的缘因。

李教授于“文革”过后，身心疲惫之余丢弃高校教鞭来到学术界，接到上级指派的任务是收集、翻译出版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资料。由于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占有语言上的优势，很快便进入情况。接触到原始材料后，发现内容与当时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南辕北辙之别，有关孙中山的情况即是一例，故一切要从头开始。从1977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开始，到1996年出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历经19年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学者生涯，才完成了那部有学术水平的著作。

1994年5卷本俄文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出第一卷，是有关共产国际史料解密的集成。适逢李教授因撰写《马林传》搜集资料访俄，其专业素养得到俄国学术界肯定。遂后李教授被委以第一卷中译之重任，其书于1997年4月出版。这本书包括文献205件，共670页，将对影响深远的史实重现于国人之前，嘉惠士林，不止一端。

李教授在上述研究和译著基础之上，又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才完成了涉及面更为广泛、研究更是深入的姊妹篇《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允为当代这一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之作。李教授的书得以出版受益于客观上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诸如：

- （一）“文革”如不结束，就没有机会进入学术机构——近代史研究所。
- （二）没有前辈黎澍的引导，就不会进入共产国际研究这一领域。
- （三）没有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学术界的相对松动，如此敏感的题材，不可能以现在的面貌出现。
- （四）苏联不解体，锁在莫斯科铁幕后的共产国际密档就不可能开放，不可能赴俄研读并与彼方资深研究人员交流，立论就不会如此周密和自信。
- （五）如果没有对新解密之俄文资料的繁重译述过程，对这段史实就不会

有独特的感悟，那么本书之叙事也就不会如此翔实，且多具新意。

由于以上主客观条件，才构成这本著作的面世，其内容广博，大刀阔斧处理丰富的国内外原始材料，又能细针密缕地写成极有条理的篇章。最难得者，於这样意识形态敏感的主题，作者不陷于立场纷争和情绪渲泄，娓娓道来，平实而服人。30年岁月专注于共产国际这一专题，其成就绝非偶然。李教授才思敏捷，文章流畅，有时不由自主地写出可贵的谏论。举例如下：

1925年孙中山逝世，莫斯科当局以它们的观点说孙中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高度”。对这个评论，李教授写下了内心的抗议，说彼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讽刺其妄自尊大，表达了她的民族自尊。

孙中山沉缅于其“西北计划”。想用俄援在西陲新疆建立军事基地，进攻北京，有人投其所好，竟建议以已有之华人编制与苏俄红军混编，在伊犁建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以一个加盟共和国的资格加入苏联。这个建议索性是要把这一大片中国领土割给苏联。论及此事，李教授补上一句“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不自觉地表达了她的情操。从本书字里行间，认识到李教授不仅是个专业的学者，更是一位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本书所述是变动不居的时代，斗争成了历史主轴。国际间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运动中又有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之争，更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反帝之争。国内有专制与民主之争，新旧军阀之争，阶级斗争与阶级和谐之争。共产党主张统一战线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本书主题陈叙虽仅八年，而世纪巨变之渊源均在其涵盖之中，然叙而不论，不言之教，陈义甚高。

本书作者穷30载岁月的经营于此一专题。思想、政制之异同，意识形态之分歧，民族感情之激荡，治乱兴衰之轨迹，昭然甚明。李玉贞教授著述之勤，实为人所钦慕矣。

邹 达
2010年于美国

前 言

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题目，至今依然十分敏感。笔者之所以涉足，乃鉴于中国和国际政治中的许多重大变化迫使每一个人再思。或再思自己的经历或梳理自己的思想，或再思研究工作如何与时俱进。本书便是这样的尝试。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它是国际共产党的组织，是苏联外交的一个秘密渠道，同时也是苏联对华外交的一个渠道。

1919年孙中山整合各路人马组成中国国民党，目标在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建立由中国国民党掌权的“革命”政府。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本书所述时期，中国国民党处于非执政地位，因十月革命中断的中俄关系也正在争取正常化的过程里。可是一个在野的中国国民党却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代表发生了日益频繁、日益公开的关系。莫斯科开展的是双管齐下的对华外交：一方面派遣正式的外交代表赴北京，与中国的正式政府接触，另一方面派遣共产国际使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联络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势力，希图推翻这个政府，并促进东亚革命。在俄共（布）党员吴廷康、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1920—1921年年初的探路之行后，莫斯科便开始了明暗两条渠道的对华外交——往北京政府和华南派遣代表，有越飞—马林搭档，接着是加拉罕—鲍罗庭搭档。俄共（布）—联共（布）在任命代表时就明确了他们的主从关系：共产国际方面的代表马林和鲍罗庭要分别服从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和加拉罕的领导。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为苏联外交服务的方针，确如俄罗斯学者们所说，共产国际的活动，“从来没有站在违背苏俄国家利益的立场上”。^①

那个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便扮演着革命势力的角色。不必从国际法的常规中去寻找依据，事情就是这样发生和演进的：它在野，但是得到外国援助。

① 阿基别科夫、什里尼亚：《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共产国际》〔Г. М. Адибеков, М. М. Ширин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 ВКП (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1943 документы〕，前言，РОСПЭН，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有的史书，如茅家琦等人的《中国国民党史》^①将孙中山在世时的这段历史概括为“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把孙中山逝世后直到1949年称为“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此说法也还贴切。

本书前半部分论述的，事实上就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约15年前，作者的同题专著^②对此有所讨论。当时由于研究不深入，想当然地重复了苏联史学的观点，无形中显现了“中毒”症状——以孙中山为核心把国民党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或使用陈炯明^③“背叛”孙中山一类的语句，再如商团事件^④，待日后有了深入研究，发现昔日观点尚待全面研究。

本书后半部分的主角是蒋介石。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蒋介石一度也是左派，他身边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度被划归左派。划分革命与否的标准是“舶来品”——对待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态度。

过去苏联史学中，国家利益这个因素长期被意识形态因素掩盖着，中国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关系因之纠葛缠绕，剪不断理还乱。本书作者认为以国家利益为轴心来认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有许多复杂问题也许可以迎刃而解。例如，从蒋介石到汪精卫，一度在莫斯科眼睛里的“左派”，最后全都与“右派”携手，公开走上反共产国际和反中共之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反”的是什么？这便是本书要探讨的内容。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国际支持中共争夺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斗争。这不是本书内容，然而从共产国际设计的各种政权结构，特别是1927年年初斯大林等让中共尽快掌权的矛盾百出的指示，无一不直接涉及苏联国家利益。今天一些俄罗斯权威学者公正地说，共产国际“年复一年越来越有力地充当联共（布）和苏联外交的工具”^⑤。

一、本专题的研究

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直接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到1991

-
- ① 茅家琦、徐梁伯、马振棣、严安林等：《中国国民党史》（上下册），鹭江出版社2009年版。
 - ② 《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
 - ③ 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上、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炯明之子陈定炎：《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1997年版；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编著：《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④ 对这个问题有深入全面的阐述的文章可见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与“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邱捷：《广州商团事变——从商人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⑤ 阿基别科夫，什里尼亚：《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莫斯科2004年版，第5页。

年苏联解体前，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阵营你死我活的对立，涉及各个国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以俄为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不仅是中共史学的基本政治取向，而且是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建设的模板。在中国史学中，斯大林主持编纂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拥有绝对强势的话语权，它被苏联史学界视为苏俄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圭臬。

对于布尔什维克历史的研究，斯大林一再突出强调“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那些没用的官僚才去做的事”。^① 于是为了与党“一致”，加上苏共强大的宣传气势，严格的舆论控制和新闻审查，^② 人们受到的教育是，共产国际理论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联解体后，学者们从严肃的科学研究角度对这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深远的著作进行了剖析，说明这是斯大林歪曲历史和树立其个人崇拜的作品。^③

在苏联时期，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明显地分成两大派别。一是被称为“资产阶级史学”的欧洲、美国、日本学者。另一派是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的苏联史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学者在许多涉及国共关系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上，一度与大陆主流观点对立。

苏联史学多少年来承袭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共产国际依据列宁关于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理论，特别从其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形成了一个带有指导性的观点，即：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角度看，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第一步谋求国家民族独立，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待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后，再进行更高阶段的革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④ 在第一个阶段，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过去苏联公布的文献多半强调的是苏联对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和中

① А. Б. 祖波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史》（Зуб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33 页。

② Л. В. 马克西缅科编：《极其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1917—1956 苏维埃国家的作家和记者》（Максименко. *Большая цензура - писатели и журналисты в стране Советов 1917—1956, документы*），莫斯科，2005 年版。

③ 《И. В. 斯大林—1920—1950 的苏联史学意识形态与历史学家的通信论文和札记讲话的速记记录汇编》，上集 [Стал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в СССР в 1920—1950 годы,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сториками, статьи и замет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выступлений,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Часть 1, (1920—1930)*]，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Второй Всемирный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莫斯科，党务出版社 1933 年版。

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国际主义援助。^①至于共产国际如何为苏联外交、为保卫苏联利益服务，则少有涉及。

共产国际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在世界无产阶级即苏俄无产阶级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即所谓的“跨越”论。这个“跨越”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中共制定政策的依据。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时，最常见的提法便是如何让中国尽快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②最能及时反映其方针和政策的，当属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③就中国的国共合作而言，研究者一般是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作为指导，遵循的也是：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仅仅是在一定时期内，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自身强大，条件成熟，就同资产阶级政党分手，由共产党单独掌权。

即使完全按照上述观点，往昔的研究中也是多重复，乏新意。于是在苏联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研究现象：那里有丰富的史料，可学者们被要求只消理解党“正确的方针”。深藏在莫斯科大德特罗夫大街15号（Большая Дмитровка №15）原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ЦПА ИМЛ）^④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的685个卷宗计210

-
- ① М. С. 贾丕才编：《苏中关系 1917—1957》（Капица：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苏联外交部编：《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第1—10卷，莫斯科，1957—1964年版；《纪念孙中山诞生120周年。论文、回忆录、文献、资料集》（Сунь Ятсен：1866—1986. К 12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莫斯科，1987年版。苏联汉学家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中国书目》（Скачко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莫斯科1932年版，1960年版。最详细地列举了有关文章。
- ② 如中国问题研究所，共产主义学院下设的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民族殖民地分部编辑的：《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中国的运用》（Стратегия и Такти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Китая），莫斯科，世界经济与政治出版社1934年版；《世界革命之路》（Пути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Шестой Расширенный Пленум Исполкома Коминтерн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
- ③ 《共产国际》杂志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19—1943，俄文版、德语版、英语版在整个共产国际存续期间一直出版，后来陆续增加了西班牙语、法语和中文版。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还有英文版《国际新闻通讯》（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 ④ 1920年9月苏俄国内战争期间便开始了收集和整理档案的工作，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由 М. С. 奥利明斯基（亚历山大罗夫）负责。1921成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后成为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1991年苏联解体后，该档案馆更名为俄罗斯现代史料研究与保管中心（РЦХИДНИ）。1999年该馆与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组织史料保管中心合并成立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

万文件和 16 万各类博物馆史料便成了铁门后的秘密。东西方学者基本都不得使用。

1969 年为纪念共产国际成立 50 周年，苏联出版了一部重头著作《共产国际与东方》。^① 其作者获准使用当时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档案。但是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改变。1978 年该书出增补版。这个版本副题为“反批评”，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改良主义和其他“歪曲”或“否定”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战略和策略的著作进行了系统批判。^②

西方学者也出版了许多著作，基调是相反的。

1956 年就有珍妮·道格拉斯的《共产国际文件》问世。^③ 在美国，学者们既翻译发表基本文献，也写有不少著述。^④ 德国历史学家弗朗茨·波克瑙的《世界共产主义——共产国际史》的主题是应当“消灭共产主义”，^⑤他认为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根本用意在于利用这些国家的运动为苏联利益服务。英国历史学家巩特尔·诺莱认为列宁这一理论旨在“从策略上考虑去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解放运动”^⑥。他把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其战略和策略的实践称之为“中国的灾难”。^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E. H. 卡尔的巨著《苏联历史》虽然也指出苏俄关于民族自决等政策的真诚性，但他同样认为共产国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策，包含着利用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为苏联外交服务的因素。^⑧ 其他作者的书基调也大致如此。如 D. N. 雅科布斯著的《M. M. 鲍罗庭——斯大林派往中

①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осток*，莫斯科，东方文献总编辑部 1969 年版。

②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осток*，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③ 中国于 1964 年出版其译本，分上下两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④ 如惠廷的《苏联对华政策 1917—1924》（A.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纽约，1954 年版；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C.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纽约，1976 年版；他和郝莲茵合编的：《革命使者——苏联顾问和中国国民党》（*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哈佛，1989 年版。勃兰特·孔拉德：《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 1924—1927》（Brandt Conrad: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剑桥，1958 年版。

⑤ F. 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共产国际史》（Borkenau. *World Communism. A history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纽约，1939 年版，1962 年密歇根再版。

⑥ 见巩特尔·诺莱：《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历史与方法》（Gunter Nollau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World Revolution. History and Methods*），伦敦，1961 年版，第 59 页。

⑦ 见巩特尔·诺莱：《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历史与方法》（Gunter Nollau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World Revolution. History and Methods*），伦敦，1961 年版，第 98—104 页。

⑧ E. H. 卡尔：《苏联历史——布尔什维克革命》（Carr. *A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伦敦，1953 年版。

国的人》。^① 这些观点事实上已经与今天的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大致相同。

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研究分析共产国际的土地农民问题政策时，切入点在于农民骚动是“自发的，与共产主义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独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认为中国共产党利用贫苦农民作为基本力量去推动苏式革命，而国民党则是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一现实考虑去制定对地主的政策，阐述的是哪个政策能调整地主和农民利益，其结果能否促进社会发展。从而在更加深远和广阔的背景上展示中国农民运动的状况，读之令人信服。^②

旅澳华裔学者，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在《中山先生与英国》^③ 一书中利用英国档案和俄国史料的对比，阐述孙中山与莫斯科的关系，称孙中山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援助是“饮鸩止渴”。^④ 他对商团事件前后广州形势和孙中山处境的详细阐述，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与前述敖光旭、邱捷文章有异曲同工之效。

曾有两个因素对中国台湾和内地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产生过影响，一个是国际上的冷战气氛，另一个就是内地和台湾的关系。两者一度以“匪”互称，致使两岸研究都不同程度出现学术问题“党化”的状况。此处仅介绍这方面的主要著作。中苏外交关系的研究著述不胜枚举，此处从略。^⑤

在台湾，比较系统阐述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的著作首先当推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⑥ 1957年该书出版两年后，德国波恩便出了其德文版。蒋介石本人说，他要“揭露苏联共产党一向借以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世界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的虚伪性，以及介绍中国国民党如何与之对抗”。他寄希望于“铁幕两边的中俄人民”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反对共产主义的战略联盟”，以“挽救人类免遭极权主义的奴役”，所以早在1961年10月10日在台北为该书的俄文版写了《序言》。不言而喻，该书俄文版在苏联解体前不可能出版。这篇《序言》沉睡了近半个世纪后才在2009年出现于其俄文版

① D. N. 雅科布斯：《斯大林派往中国的人——鲍罗庭》（Jacobs, M. M. Borodin-Stalin's man in China），哈佛，1981年版。

② 刘敬坤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农民运动”，见下卷，第309—312、317—318页。

③ 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版。

④ 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版，第472—483页。

⑤ 请见本书作者参与编译的《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年版。

⑥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版。

中。蒋氏曾孙女蒋友梅为此书题字。^①

蒋介石本人的著作书信等是最基本的史料依据，本书主要使用的是《先总统蒋公全集》，^②《蒋中正总统档案》，^③或者早些时候出版的他的讲演集。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革命文献》为这个专题的研究公布了最早的珍贵资料。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总目》，^④则为使用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而刘绍唐先生主编的被旅美史学家唐德刚称为“(刘)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的《传记文学》，自1962年创刊至今一直是荟萃丰富史料的不可多得的宝库。

早在抗战时期出版的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⑤已经提及国民党对苏关系方面的内容。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⑥是集中阐述中国国民党与中共、共产国际和苏联关系的专著。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⑦着重分析武汉政权时期共产国际在对华政策上的沿革和造成的结果。

李云汉的《中国国民党史述》^⑧使用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对于该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提纲挈领的论述。他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评论》^⑨一书中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状况条分缕析予以深入介绍。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永发的《共产革命七十年》^⑩是近年来台湾学者对中共革命进行简要而系统研究的著作，也涉及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该书字里行间少了一些“冷战”色彩，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著作。

蒋介石从1925年开始将个人的文档交专人保管，先后由毛思诚、陈布雷、周宏涛、秦孝仪负责。1949年蒋的资料运往台湾，现存于台湾“国史馆”。已经出版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毛思诚编撰、蒋亲自审定修改过一个秘本——《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后经陈布雷校订于1936年10月公开出版，更名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

① 莫斯科，播种（Посев）出版社2009年版。现任教于美国Capital University的俄裔教授A. B. 潘佐夫博士重新修订该书俄译文并写了出版前言。

②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院编纂，1984年版。

③ 台北，“国史馆”编纂，2004年版。

④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8年版。

⑤ 初版于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1938年商务印书馆、1944年再版；中华书局1960年再印。

⑥ 台北，中国学术奖助会1966年版。

⑦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⑧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

⑨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⑩ 本书分上下两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

先生》。1971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再版《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四册。199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依据《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同时参照《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出版《蒋介石年谱》一本，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此书为蒋一岁到四十岁（1887—1926年）的纪年史。

1977年由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共四十本，收录1922年至1975年蒋去世时的资料，分专著、演讲、书告、文录、别录、谈话、书面致词，以及总目录、大事年表、论著年表，辑录而成。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2003年台湾“国史馆”开始逐渐出版《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在序言中说：“《事略稿本》系蒋氏的秘书参阅相关函电令告及节抄蒋氏日记，以仿《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编撰而成。起讫年代，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总计二七四册”。目前已面世近60本，预计2012年全部出完。由于该书细致地收录蒋氏每天的重要活动，包括日记和思考，所以篇幅巨大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蒋介石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坚持写日记，近年美国胡佛研究所已经将其公开。

蒋氏两代都已作古，他们的档案有部分可供使用，由于有蒋经国遗命，这些资料近期之内尚无公之于世的可能。王力行、汪世淳在其《宁静中的风雨——蒋孝勇的真实声音》^①详细介绍了这个情况。目前笔者看到的仅仅有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②那是极其简略的回忆、杂感、书信和论述。

台湾和香港有一些出版物讨论这个领域的某一专题，例如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有台北出版的《六十年来留俄学生之风霜绰厉》，^③本书编辑期间尚在世的留俄人员或撰写或口授，留下珍贵材料。余敏玲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史料写了《国际主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④一文。台北出版的陶涵的《蒋经国传》，^⑤也有部分据俄国档案讲述蒋经国在苏联的情况。香港出版的《陈碧兰回忆录》^⑥是一本亲历纪实，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生活。

①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台北，正中书店1967年版。

③ 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编辑，台北，中华图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1996年第26期。

⑤ Jay 陶涵 (Tailor): *The General's son: Chiang Ching Kuo and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林添贵译作:《蒋经国传》，台北，2000年版。

⑥ 香港，十月书屋1994年版。